

走向翻譯之路： 北洋水師學堂時期的嚴復*

黃克武**

摘要

本文探討嚴復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時期（1880至1900年間），如何在仕途失意之下，走向以翻譯來會通中西的志業。全文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升遷概況。作者利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以及其他史料，說明嚴復由「洋文總教習」（亦稱「洋文正教習」）一職開始其教學生涯；至1884年，他「以天津水師學堂辦有成效」，得到獎敘。1889年初「奉委會辦天津水師學堂事宜」，再於1893年底升為「總辦」。

第二，嚴復參與科舉考試的經過及其影響。嚴復任職天津期間，為獲得晉升機會，有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在準備科舉考試，曾四度參加考試，均慘遭失敗。科舉的經驗，一方面讓他認識中國制度的嚴重弊端，另一方面亦讓他得以磨練文字技巧，奠立中學基礎，使他後來能以典雅文字翻譯西書而揚名於世。

第三，嚴復與呂增祥、吳汝綸之交往，及其對《天演論》的影響。嚴復與呂增祥、吳汝綸三人均屬李鴻章集團。呂增祥與嚴復是好友兼親家；吳汝綸則在1896至1903年間與嚴復密切來往。呂、吳均曾為嚴復

* 本文撰寫過程之中，承蒙福建師範大學林平漢教授協助蒐集史料；又蒙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與本所同仁潘光哲、沙培德等人指正，敬表謝忱。

** 收稿日期：2005年4月18日，通過刊登日期：2005年7月26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潤飾《天演論》的翻譯文字，因此《天演論》的成就其實不是嚴復個人的成就，呂增祥、吳汝綸等師友都貢獻了一部份心力。其中吳汝綸的角色尤其重要，他親自為之修改、作序、節錄（後以《吳京卿節本天演論》之名出版），使該書宛如受到大師「加持」，其聲望因而陡然提升。

作者認為，對嚴復而言，翻譯工作只是仕途失意之下的次一選擇，他真正想要成就者，乃得君行道的經國大業。從官場失意轉向翻譯工作，與其視為嚴復從政治領域轉到學術領域，還不如說他以學術工作來從事政治參與，企圖能「主文諭諫」、有裨時政。

關鍵詞：嚴復、吳汝綸、呂增祥、北洋水師學堂、天演論

一、前　言

嚴復(1854-1921)一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854 年出生到 1879 年自英國返國服務，屬於成長與受教時期；第二階段從 1879 至 1900 年，嚴復除了短期在福州船政學堂教書外(1879-1880)，主要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擔任教席；第三階段從 1900 至 1921 年，他在京、滬等地從事各種文教工作，至晚年退隱家鄉。第二階段大致上是從 26 歲到 45 歲（依照虛歲或當時中國通行的算法，則是 28 至 47 歲），嚴復從一個初返國門的留學生，經歷宦海浮沉、投身翻譯事業，終而躍居中國知識界的「第一流之人物」，可謂嚴復一生發展的關鍵時期。

本文將以走向翻譯之路為主軸，描寫、分析嚴復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的經歷。這一段歷史的概況，早已為大家所熟知，幾本有關嚴復的傳記與年譜，如王栻的《嚴復傳》、王中江的《嚴復》與皮後鋒的《嚴復大傳》；嚴璩（嚴復長子，1874-1942）的〈侯官嚴先生年譜〉、王蘧常的《嚴幾道年譜》、孫應祥的《嚴復年譜》、羅耀九主編的《嚴復年譜新編》等，對此均有所著墨。¹但

¹ 王栻，《嚴復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王中江，《嚴復》（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皮後鋒，《嚴復大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收入嚴復，《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545-1552；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孫應祥，《嚴復年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羅耀九主編，《嚴復年譜新編》（福州：鷺江出版社，2004）。

是因為北洋水師學堂的檔案為戰火所毀，海軍部舊檔也在國共內戰時散佚，過去學界對於嚴復在天津時期的一些關鍵性的細節，仍瞭解得不夠深入。近年來此一情況逐漸得到改善，由於新史料的挖掘，以及新研究成果的累積，讓我們可以重新檢視嚴復在天津 20 年間的發展。例如，嚴復在天津大獅子胡同一號寓所的確切地點，已有詳實的考證。²又如在台灣中部，原為辜家大宅的鹿港民俗文物館（因為嚴復的孫女嚴倬雲女士的關係），保存了嚴復任職北洋水師時期的軍服一套，黑色戎布配上金色的文飾，可想見其英挺之丰姿（附圖一），然而還有一些問題尚未解決。

本文不擬全面討論嚴復在天津的發展，只將焦點集中在幾個或者爭議性較高，或者以往學者較為忽略的議題，希望進一步認識嚴復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時期，如何在仕途失意之下走向翻譯之路，並思索這些經歷在嚴復一生中的意義。這些議題如下：第一，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升遷過程與教學情況。第二，嚴復參與科舉考試的經過。第三，嚴復與呂增祥（？-1901）、吳汝綸（1840-1903）之交往，及其對《天演論》翻譯工作的影響。這三方面含括了嚴復政治生涯的轉折，以及學術方面由奠定中學根基，進而以翻譯來會通中西的志業。

二、北洋當差，味同嚼蠟：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時期的仕途

學界近年來對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時期的研究，要以 2002 年姜鳴出版的《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與 2004 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馬自毅教授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的〈「總教習」還是「洋文正教習」——嚴復任職北洋水師學堂期間若干史實考證〉兩個作品最為精審。³根據他們的研究：

² 張紹祖指出，經已故的文史者王翁如考證，又經羅澍偉、林開明、張紹祖以及嚴復後裔嚴孝潛等人的縝密論證和實地考察，確認故居遺址在南開區古文化街大獅子胡同一號。見張紹祖，〈嚴復天津故居考證〉，「紀念嚴復誕辰 150 周年學術研討會」。福州：福建省嚴復研究會，2004 年 2 月 8-10 日。

³ 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馬自毅，〈「總教習」還是「洋文正教習」——嚴復任職北洋水師學堂期間若干史實考證〉，《歷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頁 68-84。

一、嚴復在 1880 年赴北洋水師學堂時所擔任的職務是「洋文正教習」，而非嚴璩在〈侯官嚴先生年譜〉中所說的「總教習」。二、馬自毅認為，「嚴復擔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的確切時間是光緒十五年的秋天」，至於當年是否就任「會辦」，則「未見任何相關史料」（頁 75）。三、「總教習」負責教學，一校之中人數不只一人，其地位在「洋文正教習」之上，而不及「總辦」。當時在他之前曾擔任「總辦」者，先後有吳贊誠(1823-1884)、吳仲翔與呂耀斗(1828-1895)等人。四、姜鳴指出，一般所謂 1890 年嚴復擔任水師學堂總辦之說法可能有誤，因為直至 1893 年 8 月 25 日，「呂耀斗……仍在學堂任職，嚴復出任天津水師學堂總辦的確切年份待考。」⁴（頁 259）以上的研究使我們對嚴復任官的經歷有所認識。但誠如馬自毅所說，因為未能見到嚴復「升遷情況……的官方記載」（頁 71），以及「該校的詳細行政編制、教習人數及其變動情況等資料」（頁 75），因而仍留有一些有待探究之處。⁵

我們參照其他的一些資料，可以補充、修正以上的認識。最相關的一份史料是《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中所收錄的一份嚴復的履歷。1898 年 9 月，戊戌變法期間，嚴復「奉旨進京，預備召見」，⁶在檔案中留下了一份供皇帝參閱的履歷，其中簡要地敘述了他的經歷：

⁴ 馬自毅的文章沒有提到呂耀斗。呂為江蘇陽湖人，道光 30 年進士。他早年的經歷，見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冊 4，頁 365 上。1885 年，因為中法戰爭，福州船廠在馬江海戰中受到重大的損失，在左宗棠與署船政大臣裴蔭森的請求下，李鴻章勉強同意將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吳仲翔調回福州任船政提調（見陳衍等編纂，《閩侯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據 1933 年刊本〕，卷 69，頁 32）。1887 年 8 月，吳又被調至張之洞的麾下，辦理水陸師學堂（見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頁 400-401）。同時，曾任福建船政局提調的呂耀斗，則被調來接管天津水師學堂。據《清實錄》，呂在 1888 年 12 月受到獎勵：「以辦理天津水師學堂成效昭著。直隸道員呂耀斗、仍交軍機處存記」，見陳寶琛等纂，《德宗景皇帝實錄》（台北：鼎文書局，1980），卷 263（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下），頁 533-534。1893 年 8 月 25 日之前，呂仍在水師學堂任職（見〈考校內學堂學生〉，收入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海軍函稿」，卷 4，頁 22）。

⁵ 史春林撰有〈嚴復任職北洋水師學堂期間若干史實再考證——兼與馬自毅先生商榷〉（載《福建論壇》，2005 年第 3 期），文中質疑馬的論點，他說：「嚴復是『總教習』或『洋文正教習』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根據，至於孰是孰非還有待於史料的進一步挖掘和考證」，頁 73。

⁶ 孫應祥，《嚴復年譜》，頁 125。

嚴復現年四十六歲，係福建侯官縣人，……光緒三年二月，挑選出洋，在英國格林大書院，學習各國通商交涉、律例公法、理財書、高等格致、算學、守口礮台、海軍陣法，肄業三年，考取頭等畢業……六年十月調派天津水師學堂洋文總教習，前後課導學生五百餘人，派充海軍將弁。十四年四月，報捐同知，雙月選用，十二月因在水師學堂出力，經海軍衙門保奏，請免選本班，以知府不論雙單月選用，奉懿旨依議。十五年二月，奉委會辦天津水師學堂事宜。十七年九月，因辦理海軍出力，經前北洋大臣李鴻章保奏，請以道員遇缺前先選用，奉旨允准。十九年十一月，委辦天津水師學堂。二十二年七月，委辦俄文館事務。二十四年六月，委辦洋務總局，並會辦水師營務處事宜。七月經少詹事王錫蕃保奏，奉旨北洋差委候選道嚴復，著榮祿飭令來京，預備召見。⁷

上文中所述王錫蕃保奏的內容如下：

臣前承恩命，視學閩中，在任數年，於該省人才時時留意……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候選道嚴復，本船政駕駛學生，出洋學習，于西國典章、名理之學，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學亦通貫群籍，著述甚富。水師情形，尤其所熟知專習。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閉門寡合，其立品尤為高卓。⁸

1898年9月14日，嚴復晉見了光緒皇帝，然而他的命運並未因此而有所變化。在此之前，曾有人參奏他在辦《國聞報》時「借外人為護符」，皇帝因而懷疑他有「與外人勾串」，後來經北洋大臣王文韶(1830-1908)調查，表示「實未聞有勾串情事」，皇帝才釋懷。嚴復晉見時，曾主張「變法自強」，但他又謙虛地說：「今皇上聖明已見之行事，臣之言論已同贊旒。」⁹無論如何，

⁷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冊6，頁486。王錫蕃，字季樵，山東黃縣人，1876年進士，1893-1897年任福建學政。

⁸ 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繫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907。

⁹ 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繫目》，頁630、677、995。

嚴復在受光緒召見後，並未蒙受恩寵，仍在水師學堂任職。上文中「奉公之外，閉門寡合」一語，或許很確切地描繪了嚴復在天津時期的社交狀況。

以上幾種史料，呈現嚴復的教育背景及其在官場晉升的過程，如果再配合《清實錄》等史料的記載可知：他由「洋文總教習」（亦稱「洋文正教習」，詳見下文的考證）一職開始其教學生涯；至 1884 年，以「教習都司」的身份與「遊擊卞長勝、學生伍光鑑、王學廉等」，「以天津水師學堂辦有成效」，得到獎敘。¹⁰1888 年「報捐同知，雙月選用」，¹¹後因功免選同知，直接以知府（從四品）「不論雙單月」選用。1889 年初「奉委會辦天津水師學堂事宜」，¹²1891 年升為道員（正四品），¹³再於 1893 年底「委辦天津水師學堂」（亦即升為「總辦」），此後的傳記資料則稱之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道員嚴復」、「北洋候補道、水師學堂總辦」，或依該官職（道員）之古名，稱之為「觀察」。¹⁴這一描述可以澄清以往對於其升遷過程的疑點。

嚴復在北洋的仕途還有兩點值得論述。第一，大約在 1890 年代初期，嚴復因不受重用，曾打算離開李鴻章(1823-1901)陣營，至南方投奔張之洞(1837-1909)。嚴復在 1895 年初，寫給四弟觀瀾的信中表示：「兄北洋當差，味同嚼蠟。張香帥於兄頗有知己之言，近想捨北就南，冀或乘時建樹耳。」¹⁵可惜兩人觀念有所差距，尤其是嚴復在《直報》上發表四篇評論時政的文章之後，

¹⁰ 陳寶琛等纂，《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197（光緒 10 年 11 月上），頁 802。

¹¹ 按照光緒 20 年出版戶部纂輯的《光緒朝捐納則例》（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如捐職銜，「同知，由貢監生捐銀貳千兩」，頁 139。嚴璩將此事繫於 1889 年，可能有誤，見嚴復，《嚴復集》，頁 1547。

¹² 在當時海軍系統，「會辦」是指該機構最高領導之下的一個職務，如 1885 年所設的海軍衙門，是以奕譞總理海軍事務，奕劻與李鴻章為會辦、善慶與曾紀澤為幫辦。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頁 217。

¹³ 嚴璩將此事繫於 1892 年，見嚴復，《嚴復集》，頁 1548。

¹⁴ 如時務報館編，《時務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冊 7（1896 年 10 月 7 日）上曾刊載「嚴又陵觀察助銀一百元」，頁 479。根據周作人所記，當時官場的習慣，雖有少數例外，然「無論軍事或非軍事的學堂，向來做總辦的人總是候補道」，因此嚴復要先升為道員之後，才能順利地出任總辦。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80），頁 149。

¹⁵ 嚴復，《嚴復集》，頁 731。

張之洞大怒，命御史屠仁守(？-1900)在《時務報》撰文反駁。¹⁶其後，嚴復私下稱張之洞是「妄庸巨子……恐此後禍國即是此輩」，並公開反駁張的「中體西用」論。¹⁷隨後，張、嚴兩人關係破裂，嚴復繼續留在北洋水師學堂。

第二，關於「總教習」、「洋文正教習」的頭銜，以及兩者之區別的問題。馬自毅所謂總教習人數不只一人，而地位較總辦為低的說法，大致上是正確的；但認為「正教習」與「總教習」不同，而嚴復由洋文正教習升為總教習的說法，則有待商榷。如要瞭解這些職稱及其關係，我們必須弄清楚晚清武學堂的組織。根據《清朝續文獻通考》，光緒 28 年(1902)袁世凱曾奏請設立了一所「武學堂」，該校組織章程如下：

一堂內設總辦一員，屬於軍政司，管理全堂事務。設提調一員，管理一切雜務。設總教習一員，管理訂定課程，並隨時修改監察各教習功課。教習六員，幫教六員，各教授專門之學。司帳一員，書識弁目八名。¹⁸

此一規制基本上可以反映晚清一般軍事學堂的組織架構，其中總辦、提調之下有總教習、教習、幫教等職位。

至於在課程方面，根據周作人(1885-1968)的記載，1901 至 1912 年間，位於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¹⁹在學科方面分為洋文、漢文兩大類，²⁰當時的

¹⁶ 嚴復在 1897 年 8 月 23 日所撰〈與五弟書〉說：「前者《時務報》有〈關韓〉一篇，聞張廣雅尙書見之大怒，其後自作〈駁論〉一篇，令屠墨君出名也。」嚴復，《嚴復集》，頁 733。有關嚴復的〈關韓〉與屠仁守〈孝感屠梅君侍御辨關韓書〉兩文，及其與李鴻章、張之洞關係的一個新的詮釋，可參考王憲明，〈解讀〈關韓〉——兼論戊戌時期嚴復與李鴻章張之洞之關係〉，《歷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頁 113-128。

¹⁷ 嚴復在 1901 年 2 月 19 日所撰〈與孝明書〉中說張之洞是「妄庸巨子」，「開口便說有不易常經，無不變治法云云」。見孫應祥、皮後鋒編，《嚴復集補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頁 226。在 1902 年〈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則說：「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見嚴復，《嚴復集》，頁 558-559。

¹⁸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冊 2，頁 8682。

¹⁹ 有關該校的創立與沿革，參見包遵彭，《中國海軍史》(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0)，頁 805-813。作者表示，該校「學堂章制，均係仿照天津水師學堂」，頁 807。

²⁰ 此外還有打靶與出操等戶外的課程。

術語稱之爲「洋漢功課」，兩者的比重是五比一：

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課，一天上漢文課。洋文中間包括英語、數學、物理、化學等中學課程，以至駕駛管輪各該專門知識，因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總名如此。各班由一個教習專任，從早上八時到午後四時，接連五天。漢文則另行分班，也由各教習專教一班，不過每週只有一天。²¹

周作人也詳細地記載了該校的房舍、教學狀況、教科書、功課與學生生活等細節。這些史料有助於我們認識清季水師學堂之概況。

但是北洋水師學堂的組織究竟如何呢？李鴻章的奏摺透露了一些訊息：一、1880年8月〈籌辦天津水師學堂片〉：「應就天津機器局度地建設水師學堂，俟落成後，參酌西國成規，揀派監督、教習，招考學生入堂肄業。」²²二、1884年11月〈天津水師學堂請獎摺〉，「其時北方風氣未開，學生入堂之初，非惟於西語、西學咸所未聞，即中國文字亦僅粗通。經飭監督各員嚴加約束，教習各員認真課導……。」²³由此可見，水師學堂的管理階層主要分為兩類：一類負責行政，即總辦與提調，李稱爲「監督各員」；一類負責教學，包括總教習、教習、幫教等，李稱爲「教習各員」。

在北洋水師學堂學校組織方面也有一些資訊。1887年，李鴻章又奏：「臣於光緒六年七月，奏開天津水師學堂，挑取各省良家弟子專習駕駛，八年四月又分設管輪學堂。」²⁴由此可見，1880年設置之初，水師學堂內只有「專習駕駛」的教學單位，至1882年之後，學堂內才分設「駕駛」、「管輪」兩個學堂。此一規制如再對照包遵彭的《中國海軍史》一書，可有更詳細的認識。包遵彭根據海軍部舊檔中李照恒等輯《天津水師學堂事略稿》所述，得知該校的體制如下：

²¹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頁92。

²² 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頁389。

²³ 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頁394。

²⁴ 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頁397。

駕駛學堂，計設總辦一員、監督一員、正教習一員、副教習無定數、文案一員、操教習一員、司事一員、漢文教習一員、醫官一員、書識二員、洋號手一名、洋鼓手一名，三班學生數額設一百二十名。

管輪學堂，計設總辦一員（駕駛學堂總辦兼）、監督一員、正教習一員、副教習無定數、司事一名，其餘均由駕駛學堂兼理，三班學生數額與駕駛學堂相同，設一百二十名。²⁵

以上是目前所知有關北洋水師學堂之制度最詳細的記載，文中只有正教習、副教習、漢文教習等，而缺總教習。²⁶不過，對比上述的各種史料可知，「正教習」應等同於「總教習」，也就是英文的 *superintendent*，這樣一來，正教習與總教習其實是相同的。1882 年之後，在駕駛學堂與管輪學堂各有一位，負責西學（即周作人所說的「洋文課」），嚴復擔任者乃駕駛學堂總教習，而他的同鄉、好友薩鎮冰(1859-1952)則曾擔任管輪學堂總教習。²⁷1881 年，一位曾以幼童身分留美、返國之後進入天津水師學堂（駕駛學堂）就讀的學生梁誠(1864-1917)，就稱嚴復為 *superintendent*（總教習），他說：

11月2日，我們一行九人來到這所海軍學校……此學校在一年前亦由李鴻章創辦。所有教習均係華人，總教習為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官校畢業，其他教習也曾在福州船政學堂受訓三年。²⁸

有趣的是，這一位年輕學生對嚴復的教學很不滿意，說他的數學課教得尤其不好：

我們的總教習，那位在英國受教育的，像其他中國教習一樣不知如何

²⁵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頁 781-782。

²⁶ 姜鳴的書中也有一個很類似的組織表，只是「正教習」稱為「洋文正教習」，不知所據為何。見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頁 147。

²⁷ 薩鎮冰於 1882 年奉調入北洋，1886 年調任「威遠」號兵船管帶。見馬昌華主編，《淮軍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合肥：黃山書社，1995），頁 313。

²⁸ 李鴻章在光緒 7 年 10 月所寫的〈續選學生出洋摺〉可以證明，確有數名船政學堂的畢業生，在天津擔任地位較低的「教習」一職，「閩場……後學堂學生內有許兆箕等四名，先經臣鴻章調赴天津，派充水師學堂教習及威遠練船教練水手。」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冊 2，頁 573。

施教。他上課每次唸一小段，使人一聽見他就感到噁心。數學應該是他的本行，但我們常發現他做幾何及代數時也造成不必要的問題，他照書本一字字往下唸。²⁹

因為缺乏其他的記載，我們難以斷定嚴復是否在教學方面真的那麼失敗，但如對照上述「兄北洋當差，味同嚼蠟」一語，我們或許可以想像，教書工作並沒有為嚴復帶來「教學相長」的樂趣。

總之，嚴復在水師學堂的經歷至此應該比較清楚。嚴璩所謂「總教習」不是錯誤的，是指駕駛學堂洋文總教習，亦稱為「正教習」或「洋文正教習」，而檔案之中要加上「洋文」，表示他所教的科目是西學，並與學堂中的「漢文教習」（陳錫讚曾任此職，下詳）的職務有所區隔所致。³⁰再者，嚴璩所謂 1889 年「直督李公派為會辦水師學堂」與檔案資料符合，而他所說 1890 年「直督李公派為總辦水師學堂」則是錯誤的，應於 1893 年底，在呂耀斗去職之後，嚴復才升任總辦。

三、嚴侯本武人，科舉偶所慕：嚴復與科舉制度

在天津的二十年之間，嚴復的仕途限於水師學堂，無法更上層樓，和他缺乏正式的科舉功名有直接的關係。這一點涉及嚴復的「中學」（或稱舊學）。他在中學方面的根基，必須追溯到幼年時（1863 至 1865 年）跟隨塾師黃宗彝研讀經學與理學，打下基礎，此一階段的教育，一方面是啓蒙，另一方面也為科舉鋪路。在《福建通志》與《閩侯縣志》的「文苑」中，留有黃宗彝的一篇小傳，兩者的文字大同小異：

黃宗彝初名燧，字聖謨，又字肖巖，自號左鼓右旗山人……幼聰穎……

²⁹ 高宗魯譯註，《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頁 64。很遺憾地，此信只公布了中譯本，未能見到英文原件。梁誠後擔任駐美公使，其生平見羅香林，《梁誠的出使美國》（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7）。

³⁰ 檔案中亦有「洋教習」、「洋員教習」之名，此則指擔任教習之外國人，與「洋文教習」意義不同。

然屢試不售。父行賈建寧暴卒，遺篋金五千，盡沒於其族父。某家人大譁，令與較。宗彝曰：以財故令吾族惡名暴於世，吾不為也。……宗彝與同里劉家謀、謝章挺交最篤，治古文有義法，尤精小學，遺詩一卷、婆娑詞二卷、方言古音考八卷、雜文若干篇。³¹

由此可見，黃宗彝是一個受到當時經學考據之風氣影響的傳統士人，他極重倫理道德，然並無科舉功名，此外黃宗彝還染有鴉片煙癮，³²此一傾向，在耳濡目染下對嚴復自然有所影響。1865 年，黃宗彝過世之後，嚴復又跟隨其子黃孟修（增）讀書，孟修秉承父親的學問，乃「同治癸酉科拔貢，通經學、小學、史學，院試輒冠其曹，與張侍郎亨嘉齊名，顧懶不著……身後不存一字矣。」³³嚴復在他們兩人的教導之下，研習傳統典籍，也開始喜好書法與詩詞。其後嚴復投考福州船政學堂，又赴英國留學，學習海軍，走上一條與傳統士人經由科舉晉身截然不同的道路。在此期間，嚴復對西學的認識無疑地有長足的進步，並深受郭嵩燾(1818-1891)賞識。³⁴然而從進入船政學堂到留英返國之間，他在中學方面應該沒有太多的進展。1879 年，繼任駐英法公使的曾紀澤(1839-1890)，曾私下批評嚴復的性格與文章：

宗光才質甚美，穎悟好學，論事有識，然以郭筠文褒獎太過，頗長其狂傲矜張之氣，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鈕頓傳、曰論法、曰與人書，於中華文字未甚通順，而自負頗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厲之，愛其稟賦之美，欲玉之於成也。³⁵

曾紀澤上文中所說的「於中華文字未甚通順」一語，很可能是為了避免嚴復過度驕傲自負而給予「戒厲」，但亦顯示出此時嚴復在文字運用上，或許仍有瑕

³¹ 陳衍等編纂，《福建文苑傳》，《福建通志》（福州：福建通志局，1922），卷 9，頁 3 下-4 上。陳衍等編纂，《閩侯縣志》，頁 302-303。

³² 華嚴，〈吾祖嚴復的一生〉，收入王慶成主編，《嚴復合集》（台北：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卷 5，頁 318。

³³ 陳衍等編纂，《閩侯縣志》，頁 303。

³⁴ 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 269-281。

³⁵ 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頁 278。

疵，「其文理尙未昭晰」，³⁶因而受到挑剔。

嚴復在返國之後，也受到類似的批評，有人認為他的文字不雅馴，且缺乏經史根基。如嚴復的好友陳衍(1856-1937)說：「幾道學無師承，少壯時文字尙多俗筆……〔有〕滑易之病。……詩少傑作，用典亦偶有錯誤。」³⁷陳衍又說，嚴復的文字缺乏經史根基，有空疏之弊，「爲學總須根基經史，否則道聽途說，東塗西抹，必有露馬腳狐尾之日。交好中遠如嚴幾道、林琴南，近如冒鶴亭，皆不免空疏之譏。」³⁸此外，據說羅豐祿（1850-1903，曾與嚴復共同赴英，襄辦管理事宜；時任北洋水師營務處總辦）也對嚴復有類似的批評，他說：「嚴又陵文章何足數，不過熟習史漢，試舉十三經中能精通一經乎？世有不通經而號稱通人乎？」³⁹這些批評雖不一定正確，卻可反映他人對嚴復文章的觀感，也和嚴復的「自謙」之詞相符合。⁴⁰

再者，1885 年開始，嚴復與鄭孝胥(1860-1938)交往。鄭乃科場得意的「八閩解元」(1882)，1879 年，鄭又娶了福建船政督辦吳贊誠的女兒，後隨李經方(1855-1934)於 1890 年出使日本。1885 年，鄭到天津投身李鴻章幕府之後，因爲羅豐祿與呂增祥的關係，認識了嚴復。鄭、嚴兩人相談甚歡，結爲好友，嚴復還請鄭孝胥教導其子讀書。⁴¹鄭孝胥在初次閱讀嚴復的文字之後，有以下的

³⁶ 這是郭嵩焘轉述曾紀澤批評嚴復的話。見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與道咸同光時代》，頁 278。

³⁷ 黃曾樾輯，〈陳石遺先生談藝錄〉，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冊 1，頁 706。

³⁸ 錢鍾書，〈石語〉（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9），頁 31。冒鶴亭即冒廣生(1873-1959)，爲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後人，以詩人、詞家聞名於世。

³⁹ 吳家瓊，〈嚴復軼事及《福建通誌》不爲立傳的原因〉，《嚴復先生資料輯》（未刊手稿，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原書無頁數。

⁴⁰ 嚴復曾致書梁啟超，表示自己以西學見長，在中學方面有所限制，「僕於西學，特爲於眾人不爲之時，而以是竊一日之長耳……若夫僕中學之深淺，尤爲朋友所共見非爲謙也。道不兩隆，有所棄者而後有取。加以晚學無師，於聖經賢傳，所謂宮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門而入之。」嚴復，《嚴復集》，頁 516。

⁴¹ 嚴璩當時 12 歲（虛歲），鄭孝胥的日記中有許多有趣的小故事，顯示嚴璩是一個「黠頑」的孩子。如 1885 年 8 月 19 日，「兒字伯玉。余翻書，忽中夾一紙，審是兒署，大書曰：『伯玉仁兄大人正，太夷弟鄭孝胥。』忍笑置之」；8 月 29 日，「晨，入齋。兒讀復匿數，僞言已如數。余舉其匿數，因噤不語。」見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65、67。

印象：「觀又陵文，天資絕高，而粗服未飾。」⁴²鄭孝胥又將嚴復的文字與羅豐祿的文字相比，「閱稷臣文一首。其人好沈思，可與詣古，視嚴又陵氣不如，而思路過之。」⁴³從以上的評論可見，鄭認為嚴復的文章有氣勢，思路卻不夠清晰，且缺乏修飾。但鄭孝胥對嚴復的抱負與能力則深表欽佩。他在送給嚴復的一首詩中表達出他的讚賞：「慷慨懷大志，平生行志哀，嗟君有奇骨，況復負通才。」⁴⁴很顯然地，對鄭孝胥來說，嚴復文章之氣勢，源自他的「大志」與「通才」。

嚴復也曾多次寫詩回贈。在詩文往來之中，嚴復得以更為深入中國古典文化。⁴⁵但是因為嚴復缺乏科舉功名，總讓他覺得自己因此而不受重用，難以進入統治階層的核心。在嚴璩所寫的〈侯官嚴先生年譜〉中，談到當時嚴復的心聲，「自思職微言輕，且不由科舉出身（當時仕進，最重科舉），故所言每不見聽。欲博一第入都，以與當軸周旋。」⁴⁶因此嚴復花了 108 兩銀子，捐了一個監生，⁴⁷從 1885 年開始，四度參與科舉考試：1885 年參加福建的鄉試、1888 年參加順天鄉試、1889 年參加順天恩科鄉試、1893 年再次返回福建參加鄉試。遺憾的是，四次考試均名落孫山。

嚴復參加科舉考試，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甚愉快的經驗。1885 年 7 月 19 日，嚴復「奉母歸，且應鄉闈」，鄭孝胥還為他送行，直到運河岸邊。⁴⁸1886

⁴²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頁 60。

⁴³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頁 60。

⁴⁴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頁 61。

⁴⁵ 嚴復在北洋水師時期與當代著名的文士頗有過從，尤其是福建籍的陳寶琛、鄭孝胥、林紓、陳衍、沈灝園等人，此種師友交遊是「古人成學的一個重要途徑」。余英時，〈嚴復與古典文化〉，「嚴復思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台北：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9 年 7 月 9 日，頁 17。該文後收入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 115。

⁴⁶ 嚴復，《嚴復集》，頁 1547。

⁴⁷ 據許大齡的研究，「乾隆元年，下諭停止各項惟餘捐監。其銀數規定俊秀納銀一百八兩，武生納銀一百兩，在戶部繳納」，其後該數額有增有減。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明清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77。根據戶部纂輯，《光緒朝捐納則例》，「監生，由俊秀捐銀壹百八兩」，頁 135。

⁴⁸ 《鄭孝胥日記》，頁 62。

年 9 月 12 日（農曆八月初四日），也是科舉考試前五天，住在福州光祿坊道南祠謝姓友人家中的嚴復，寫了一封信給家住螺洲的好友陳寶琛(1848-1935)，⁴⁹信中說：「光此番以奉母回閩之便，於天津海防事例內報捐監生，領有戶部國學二照，費銀足成一百八兩。」但在報名考試的過程中，可能是登錄過程出錯，福建的學官要求他再補交捐納銀兩，否則將「扣送入闈」。嚴復無計可施，只好寫信請陳寶琛幫忙：

事敗垂成，宗光無懊惱，計唯有重求我公，明晨撥冗來城，代為一到院中向學憲緩煩，破其疑團。事若獲□，則宗光後此能得寸進，皆我公高厚之賜也。急切屏營，恕其草草。耑此敬叩禮安。宗光敬上。八月初四夜。⁵⁰

這件事情或許經由陳寶琛的協助而得以解決，使嚴復能夠順利參加考試。然而他卻未能上榜。⁵¹這一次的經驗，無疑地使他對科舉制度的弊病留下深刻的印象。

嚴復返鄉考試，而未能上榜之事，可能受到李鴻章的注意，同時御史陳琇瑩亦「奏開算學取士」，李鴻章乃於 1887 年 6 月奏請〈學堂人員請一體鄉試片〉：

查學堂之設，雖為造就將才起見，要皆以算學入手，兼習經史，其中亦有文理清通而志切觀光者。儻異日得由科甲進身，則文武兼資，未始不可為御侮干城之選。惟該學生等籍隸各省，程途遠隔，若令先期回籍，靜候學臣按臨，未免廢時曠課。⁵²

⁴⁹ 陳寶琛與嚴復訂交甚早，目前尚存嚴致陳函三十餘封。陳於中法戰敗後，受到牽連閒賦鄉居二十餘年。據林慶元、林清榮，〈陳寶琛大事記〉，「光緒 11 年(1885)，38 歲。二月，陳寶琛因前與張佩綸薦雲南巡撫，廣西布政使唐炯、徐延旭督師出防，而唐徐於涼山，太原相繼潰敗，被定斬監候，是月，陳寶琛以『薦人失察』之過，被降五級『調用處分』。自是以後，『閑放之歲月，遂假吟咏自遣』。」見唐文基等編，〈陳寶琛與中國近代社會〉（福州：陳寶琛教育基金籌委會，1997），頁 587。有關嚴、陳兩人的友誼，見巫光榮，〈嚴復與陳寶琛〉，《嚴復與家鄉》（福州：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1985），頁 51-54。

⁵⁰ 《嚴復函札彙鈔》（未刊手稿，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

⁵¹ 此次考試，嚴復的好友張元奇（珍武）中舉，光緒 12 年又成進士。

⁵² 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頁 398。

因此他請求「於鄉試之年，除各省士子兼通算學者，由本省學臣考試咨送外，所有天津水師、武備學堂學生及教習人員，屆時就近由臣遴選文理清通者，開單咨送總理衙門聽候考試錄送，一體鄉試，以資鼓勵而廣登進。」⁵³由此可見，李鴻章對水師學堂的師生參加科舉一事，採取積極鼓勵的立場，在此氣氛之下，嚴復在 1888、1889 年又兩度參加順天鄉試，但也都慘遭敗北。

嚴復在準備參加上述科考的過程中，亦曾得到友人協助。例如，當時以諸生出身，在水師學堂擔任漢文教習的陳錫讚，也在準備考試，據其子陳季庭表示：陳錫讚曾教嚴復「做八股制藝」。⁵⁴他家中還保留了嚴復於 1892 年送給他父親的一首詩，他將這一首詩交給嚴復的長子嚴璩，編入《瘞壘堂詩集》。該詩題為〈送陳彤甫歸閩〉：

四十不官擁皋比，男兒懷抱誰人知？藥草聊同伯休賣，款段欲陪少游騎。
君來渤海從去春，黃塵埃塙愁殺人。末流啟肯重儒術，可憐論語供燒薪！
豈奇歷落不稱意，高陽酒徒兀然醉。……平生賤子徒堅頑，窮途誰復垂溫顏？
當年誤習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⁵⁵

根據嚴璩所述，該詩乃「彤甫丈哲嗣季庭兄，就先君所手書為贈者，錄以見示」，嚴璩在該詩之下有一個註解：「陳名錫讚，以諸生充水師學堂漢文教席，後舉己丑進士，官主事。」⁵⁶以往我們對這首詩的背景不夠清楚，然而如果查對《閩侯縣志》與《增校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可以確定陳錫讚乃辛卯(1891)中舉，壬辰年(1892)(而非己丑，1889)成進士。⁵⁷這樣一來，該詩應係陳錫讚考上進士後，要離開水師學堂時，嚴復所題贈者。嚴復看到一同準備科考的同鄉、同事、好友，連續兩年科舉得意，自己卻屢受挫折，因而深有感觸，說出「當年誤習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

⁵³ 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頁 397。

⁵⁴ 吳家瓊，〈嚴復軼事及《福建通誌》不為立傳的原因〉，《嚴復先生資料輯》。

⁵⁵ 嚴復，《嚴復集》，頁 361。

⁵⁶ 另一版本作：「彤甫名錫己丑進士官刑部主事侯官人」。見嚴復，《瘞壘堂詩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1 上。

⁵⁷ 陳衍等編纂，《閩侯縣志》，頁 125、134。

次年(1893)，已經擔任水師學堂會辦的嚴復，為了一展「男兒懷抱」，再度返鄉參加科考，此次路經上海，與同鄉葉大莊（同治 12 年舉人，後任內閣中書，1894 年入張之洞幕府辦理洋務）一同返鄉，並住在葉家的玉屏山莊。⁵⁸這一次考試嚴復再度落榜，此後亦不再嘗試，後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晚翠），則在同一場考試中得了第一名。⁵⁹當時有一些師友對嚴復未能獲得功名，因而受到歧視，無法大展長才，感到忿忿不平。鄭孝胥曾說：「嚴書滿天下，身世尙相棄，吾儕懷不平，扼腕定誰冀。」⁶⁰大力抨擊科舉制度，主張「廢科舉，興學校」的吳汝綸也說，「執事兼總中西二學，而不獲大展才用，而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之事。」⁶¹

以往的學者談到嚴復的科舉經驗之時，往往強調此一經驗讓他對八股文感到反感，嚴復在 1895 年《直報》上寫的〈救亡決論〉一文，批評八股取士有三大弊病：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使天下無人才。嚴復說：

總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破壞人材，國隨貧弱……救之之道當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則庶乎其有鳩耳。⁶²

1898 年，《國聞報》亦刊有一篇〈道學外傳〉，譏諷自明代八股取士以來，只造就了「面帶大圓眼鏡，手持長桿煙筒」，認為「凡文之不從時文出者，盡鹵莽滅裂耳」的道學先生。⁶³這一篇文章是否為嚴復所撰，仍有爭議，但其批判八股、時文的旨趣，無疑與〈救亡決論〉中的觀點非常類似。總之，在嚴復

⁵⁸ 王鐵藩，〈嚴復家鄉陽岐調查記〉，收入福建省嚴復研究會編，《93 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頁 589。

⁵⁹ 陳衍等編纂，《閩侯縣志》，頁 134。

⁶⁰ 鄭孝胥，《海藏樓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59。

⁶¹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2），冊 3，頁 145。1896 年之後吳汝綸即主張改科舉、興學校。見施培毅，〈我國近代教育先驅吳汝綸〉，《江淮論壇》，1995 年第 1 期，頁 88-90。

⁶² 嚴復，《嚴復集》，頁 43。

⁶³ 嚴復，《嚴復集》，頁 483-485。

以及其他人努力之下，清廷終於在 1905 年廢止了科舉制度。

嚴復認識到廢科舉是數千年來的「莫大之舉動」，1906 年他說：「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並預測未來將造成重大的影響。⁶⁴不過，科舉廢止之後，科考失敗的陰影仍繼續存在嚴復心中。1908 年，鄭孝胥將他於 1882 年參加科考中舉的文章送給嚴復鑑賞。此舉在清末頗為流行，根據當時的規矩，「凡是中元的詩文，首場三藝以及試帖詩，衡鑒堂闈墨，都要頒刻，以供士子揣摩」，⁶⁵同時也可以送給師友鑑賞。如 1885 年 9 月 20 日，鄭孝胥見李鴻章時，即「以大卷呈閱」，李「取卷批閱曰：『好，有別致矣。』俄笑曰：『勁氣直達矣。』」⁶⁶我們不清楚鄭孝胥為何在這時要將科考試卷送給嚴復，無論如何，嚴復在閱讀鄭的試卷之後，勾起了他的感懷。1908 年 6 月 16 日，他寫了一首〈題鄭太夷時文〉的五言古詩，詩中表示：「讀書跂祿仕，道已成禽犧……讀君制藝文，三嘆天生獨」，⁶⁷對照《鄭孝胥日記》可知，該詩乃「批評壬午所為制義一冊」。⁶⁸三天後（6 月 18 日），鄭作〈答嚴幾道〉，其中有「嚴侯本武人，科學偶所慕。棄官更納粟，被刑嘗至屢」。接著鄭又說道 1896-1897 年間自己考進士失敗的經驗：「回思丙丁間，春闈我猶赴。都門有文會，子必作寄附。傳觀比尤王，一讀舌俱吐。誰知厄場屋，同輩空交譽。天傾地維絕，萬事逐煙霧。」⁶⁹這些話觸動了嚴復心中的痛處。根據鄭的日記，6 月 25 日，「嚴又陵復遺五言一首……夜，作再答又陵詩一首。」⁷⁰嚴復的詩題為〈太夷續作有被刑諸語見斬乃為復之〉，詩中將一生參加科舉的委屈與心頭的陰影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一

⁶⁴ 嚴復，〈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嚴復集》，頁 166。

⁶⁵ 嚴復曾在該詩之後題「蘇戲見示四書文」，見盧美松主編，《嚴復墨迹》（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4），頁 11。有關鄭中舉時文的內容與分析，見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頁 35-45。

⁶⁶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頁 71。

⁶⁷ 嚴復，《嚴復集》，頁 367。

⁶⁸ 嚴復，《嚴復集》，頁 1146。

⁶⁹ 鄭孝胥，《海藏樓詩集》，頁 179。

⁷⁰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頁 1147。

首詩一開始是「吾聞過縊門，相戒勿言索。人情諱失敗，常恐遭發暴。」⁷¹根據錢鍾書(1910-1998)的考證，開始的兩句詩出自西諺：

「吾聞過縊門，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貼。余嘗拈以質人，胥歎其運古入妙，必出子史，莫知其直譯西諺 Il ne faut pas parler de corde dans la maison d'un pendu 也。點化熔鑄，真風爐日炭之手，非「喀司德」、「巴立門」、「玫瑰戰」、「薔薇兵」之類。⁷²

上文所謂的西諺，是法國的一句古諺語（約源自十六世紀），意指「切忌在上吊自縊者的家中，說到繩子」(Do not speak of rope in the family of one who has been hanged)。⁷³該詩將科考失敗比喻懸梁自盡，可見此事對嚴復的打擊。接著嚴復描寫自己參加科考的經驗，並表達閱讀時文的心得。他說看到鄭孝胥的時文範本，才覺悟到自己多次落榜，一方面因為運氣不好，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沒有掌握到撰寫八股文的方法：

昨者讀君文，猶病得發藥，嚴整比治軍，交通覘脈絡，始悟為成梟，不只祿命惡。向令能如斯，一第自可博。得失豈偶然，了了見強弱。⁷⁴

鄭孝胥看了之後，當晚立即寫了〈偶記林穎叔述左文襄語再答幾道〉，詩中引用陝甘總督左宗棠(1812-1885)與林壽圖（1822-1898，字穎叔，號歐齋。道光25年進士，時為陝西布政使）的對話：「進士勝翰林，舉人又過之，我不得進士，勝君或庶幾。歐齋憤然答，霞仙語益奇。舉人何足道，卓絕惟秀才。」⁷⁵將科舉功名與人才等第和事功的不對等關係加以調侃。鄭、嚴之間有關科舉時文的四首詩，後來在《東方雜誌》正式發表，題為〈鄭蘇盦嚴又陵酬和近作〉。⁷⁶

71 嚴復，《嚴復集》，頁368。

72 錢鍾書，《談藝錄》（上海：開明書店，1948），頁29。後來的版本刪除了法文的原文。

73 作者感謝陳三井先生協助，將該句法文翻譯為中文。

74 嚴復，《嚴復集》，頁368。

75 鄭孝胥，《海藏樓詩集》，頁179。左宗棠於道光12年(1832)中舉，其後三試不中，未成進士，此一經歷與鄭孝胥有些類似。霞仙是劉蓉(1816-1873)，以諸生從戎，累官至陝西巡撫。見陸寶千，《劉蓉年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76 鄭孝胥、嚴復，〈鄭蘇盦嚴又陵酬和近作〉，《東方雜誌》，第5年第7期(1908)，「文苑」，頁1-2。

嚴復怨恨科舉的情結於 1909 至 1910 年才略為抒解。1909 年底，由梁敦彥(1857-1924)、于式枚、紹昌等人，考察各省表現優異的留學生，分別授以進士與舉人出身。⁷⁷1910 年初，決定該次共審核通過 23 人，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辦理鐵路有成的詹天佑(1861-1919)，賞給「工科進士」，其次則是嚴復，賞給「文科進士」，此外，法政學堂總教習張康仁則授予「法科進士」。嚴復的學生伍光建、王劭廉也同列文科進士。將表現優異的留學生分授工科、文科與法科進士頭銜，充分反映朝廷為溝通新舊制度所做的努力。當時審核者有關嚴復的推薦文如下：

候選道嚴復福建人，船政學堂出身，派往英國國家海軍學校學海軍專門，又兼習文家，博綜經史，譯著政學書最多，風行海內。學部奏派充兩次考試游學畢業襄校官、編定名詞館總辦、學部丞參上行走。⁷⁸

1 月 17 日，消息傳來，58 歲的嚴復並不感到特別的高興，據說「泊然無所動」，⁷⁹他寫了一首詩發抒內心的感受，「平生獻玉常遭刖，此日聞韶本不圖。豈有文章資黼黻，敢從前後說王盧」，⁸⁰再次表達「遭刖」的痛苦經驗，也謙虛地說自己的文章對國家沒有什麼幫助，不敢講論排名先後，其中是否對未能名列第一感到失望，則不得而知。

由此可見，科舉考試的經驗對嚴復的重大影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準備科舉考試的過程，對嚴復個人成長來說，可能不完全是負面的。余英時的一篇文章曾指出一個「塞翁失馬」的現象，他認為，嚴復從 30 至 40 歲之間為準備考試而閱讀經史典籍，此一功夫不失為對於運用古典文字的一種有效訓練。因此嚴復在此十年間，有系統地沉浸於舉業之中，使他補足了自 15 歲開始便中斷的傳統教育，「經過這一階段，他雖然是『半路出家』的留學生，他在中國

⁷⁷ 據說「詹天佑力懇袁世凱謀此事，然不能為一人謀，請詔各省保薦」。見王蓮常，《嚴幾道年譜》，頁 79。

⁷⁸ 《學部官報》（台北：故宮博物院影本，1980），期 113(1909)，頁 1-3。

⁷⁹ 王蓮常，《嚴幾道年譜》，頁 79。

⁸⁰ 嚴復，《嚴復集》，頁 378。

古典文化的一般修養已與同時代的士大夫沒有很大的區別了。」⁸¹

余先生的論斷是很正確的。有一些相關的表述，談到嚴復文字與科舉時文的關聯，可以支持他的說法。例如，晚清的國學大師章炳麟(1868-1936)曾談到嚴復的文字，因為兩人政治立場、學術經歷不同，他的觀察無疑地有偏見，但也可以旁證嚴復的文字與科舉之關係：「復辭雖飾，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⁸²「嚴氏固略知小學，而於周、秦、兩漢、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讀矣。然相其文質，於聲音節奏之間，猶未離於帖括。申夭之態，回復之調，載飛載鳴，情狀可見，蓋俯仰於桐城之道左而未趨其庭廡者也。」⁸³更直接表示此一觀點的是錢基博(1887-1957)，他在 1931 年出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完全同意章炳麟上述的論斷，認為章氏「不愧知言之士」。錢基博將嚴復（與章士釗）的文章說是新文學流派中的「邏輯之古文」，而與梁啟超的新民體與胡適的白話文鼎足而三。錢氏認為，嚴復文章的特點就是將八股與邏輯結合起來，「出之以文理密察」，因而開創出獨特的風格。茲不避冗長，徵引如下：

康有為、梁啟超之視嚴復、章士釗，其文章有不同而同者；籀其體氣，要皆出於八股。八股之文昉於宋、元之經義，盛於明、清之科舉，朝廷以之取士者逾六百年。而其為之工者，無不嚴於立界（犯上連下，

⁸¹ 余英時，〈嚴復與古典文化〉，《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頁 115。

⁸² 章炳麟，〈與人論文書〉，《太炎文錄初編》，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冊 5，頁 168。

⁸³ 此段文字引自〈社會通詮商兌〉，《太炎文錄初編》，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頁 323。章太炎與嚴復交往的經過還有待澄清。章太炎早年深受嚴復影響，1900 年初，兩人曾有書信來往，章還將自己的詩文送給嚴復指正。見嚴復，〈致章太炎〉，收入王慶成主編，《嚴復合集》，冊 5，頁 2-3。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5），頁 33-37。當年 7 月，兩人也共同參與中國國會，見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107。其後，章種族革命之意念日強，力主反滿，與嚴復思想分道揚鑣。尤其是嚴復翻譯《社會通詮》、攻擊種族革命之後，章在《民報》上寫《社會通詮商兌》，給予非常嚴厲的批評。一般人不太注意到，其實在《國聞報》階段，嚴復就對章太炎的翻譯工作深表不滿。在〈論譯才之難〉，他批評章太炎與曾廣詮合作翻譯的斯賓塞《進說》（按：此文係 1857 年“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一文之翻譯）「不能通其意……貿然爲之，滿紙唵嚙也」，而且嚴復還另行比對原書，重新翻譯首段以爲示範，這樣的批評可能使章懷恨在心。見嚴復，〈嚴復集〉，頁 91。

例所不許），巧於比類（截搭釣渡），化散為整，即同見異，通其層累曲折之致，其心境之呈現心力之所待，與其間不可亂不可缺之秩序，常於吾人不識不知之際，策德術心知以入慎思明辨之境涯而不墮於鹵莽滅裂。每見近人於語言精當，部份辨晳，與凡物之秩然有序者，皆曰合於邏輯矣；蓋假歐學以為論衡之繩墨也。然就耳目所覩記，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此論思之所以有裨，而數百年來，吾祖若宗德術心智之所資以砥礪而不終萎枯也歟？迄於清末，而八股之文，隨科舉制以俱廢；而流風餘韻，時時不絕流露於作者字裏行間。有襲八股排比之調，而肆之為縱橫軼宕者；康有為、梁啟超之新民文學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以文理密察者，嚴復、章士釗之邏輯文學。⁸⁴

以上的分析，將嚴復文章與科舉之關係說得十分清楚。不過他與章炳麟、余英時不同之處是，他認為嚴復不完全跟著「帖括」、「制義」，而是能將八股對於文字的要求與西方的邏輯思辨結合起來，才使他展現出新的魅力。⁸⁵

總之，嚴復任職天津期間，有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在準備科舉考試，科舉的經驗，一方面讓他認識中國制度的嚴重弊端，另一方面亦提供他磨練文字的技巧，奠立中學的基礎。但是，嚴復後來能以典雅古文從事翻譯而揚名於世，絕不單純地依靠科舉時文，他能擺脫時文的桎梏，還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其一是錢基博所說的將中學與西學接軌，其二則是桐城派文風的薰陶。這兩點則要追溯到 1890 年代，嚴復與呂增祥、吳汝綸等人的交往，而充分表現在《天演論》的翻譯之上。

⁸⁴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界書局，1936），頁 361-362。

⁸⁵ 陳衍也認為，嚴復的文字受到西方邏輯學的影響，但是他指出，嚴復所結合者乃諸子文風與西方邏輯。他說，「幾道……厥後研究子部，且得力於外國名家文法，盡變其往時滑易之病」。黃曾樾輯，〈陳石遺先生談藝錄〉，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頁 706。

四、假令早遭十年，豈止如此？ 呂增祥、吳汝綸與嚴譯《天演論》

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時期，一方面準備科學、研治中學，另一方面也開始接觸西書，早在 1881 至 1882 年，他即閱讀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作品，甲午戰後又受到戰敗的刺激，覺悟到只有「多看西書……是真實事業」，可以掌握「治國明民之道」。⁸⁶不久即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其中使他「暴得大名」的第一個作品，即是 1895 至 1898 年翻譯的《天演論》。

隨著 1898 年《天演論》的正式出版，嚴復不但躍居中國「第一流之人物」，同時也帶來國際性的聲望。1899 年 9 月，日本《萬朝報》主筆、也是專研中國歷史的學者內藤虎次郎（1866-1934，號湖南）至天津訪問，透過《國聞報》館主西村博，以及該報記者方若、安藤虎男等人的介紹，與天津「精通時務」的六位名士會面，其中名列首位者即嚴復。⁸⁷從兩人的會談內容，可見嚴復在當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根據內藤在《燕山楚水》中的記載，他在與嚴復見面之前，所得到的相關訊息如下：

嚴復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現為北洋候補道、水師學堂總辦。……嚴復年齒四十七，二十年前曾遊日本，十年前赴英國游學三年，通英語，已將赫胥黎之書翻譯、印行，名為《天演論》。⁸⁸

兩人見面時，採取筆談的方式，其中論及翻譯問題。內藤氏說閱讀《天演論》之後，覺得「文字雄偉，不似翻譯，真見大手筆。」嚴復則回答：「因欲使觀者易曉，不拘原文句次，然此實非譯書之正法眼藏。」又說：「近所譯計學一

⁸⁶ 嚴復，《嚴復集》，頁 780。

⁸⁷ 有關嚴復與《國聞報》的關係，見李斌，〈嚴復與《國聞報》〉，收入福建省嚴復研究會編，《嚴復與中國近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8），頁 540-552。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台大文史哲學報》，期 56(2002)，頁 42-48。

⁸⁸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1），頁 30。以上的敘述大致正確，其中訪問日本之事，應係 1876 年 2 月，嚴復在福建船政局實習期間，搭乘「揚武」號訪問日本的長崎、兵庫、大阪、神戶、橫濱等地。至於嚴復在英國的時間，是從 1877 年 5 月至 1879 年 8 月左右，僅兩年多。

書，則謹守繩墨，他日書成，當有以求教。」⁸⁹內藤所說的「不似翻譯」一語是對《天演論》的讚美之詞，這也顯示《天演論》在「化西為中」的文字功夫上達到很高的造詣。不過，嚴復也感覺到《天演論》偏重「信、達、雅」翻譯三原則中的「達」，而在「信」方面有所缺失。

《天演論》的成就並非一蹴即得，而是多次修改的成果。在 1901 年南京富文書局版的《天演論》，書名由呂增祥題字（附圖二），內文則有吳汝綸的序言，由此可以顯示嚴復與呂、吳之深厚關係。事實上，呂、吳都對《天演論》翻譯文字的修改、潤飾，有重要的貢獻，可謂該書的幕後功臣。

呂增祥乃嚴復「至交」、「執友」，⁹⁰又稱為呂君止、呂秋樵、呂太微、呂臨城、呂開洲（曾任開州知州）等，安徽滁州人。呂、嚴也是親家，呂的大女兒蘊玉嫁給嚴復的學生伍光建，二女兒蘊清則嫁給嚴復的長子嚴璩。⁹¹據嚴璩《渝巒堂詩集》中〈過呂太微〉詩下註「外舅諱增祥，滁州人，己卯（按：1879 年）舉人。以知縣發直隸。歷官臨城、天津、南宮、獻縣等縣，開州知州，卒於官。所至有惠政」；在〈寄太微日本〉下，則註「時外舅出使日本為參贊」。⁹²

嚴復與呂增祥之訂交大約是在 1880 年嚴復到天津之後，當時呂增祥在李鴻章的淮軍集團之中，和李兆珍（字星治，1846-？）、勞乃宣(1843-1921)並

⁸⁹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頁 33。

⁹⁰ 嚴復，《嚴復集》，頁 347、538。

⁹¹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頁 1796。嚴家理曾說，嚴璩（嚴伯玉）與呂蘊清因「包辦婚姻」，加上個性不合，夫妻感情不睦，「夫婦間只有『責善』，從無笑言，伯玉的一生沒有從她那裡得到一天的家庭樂趣。」兩人在 1912 年生了一女（倚雲），因為無子嗣，蘊清乃為伯玉納了兩個妾，第二個妾又生了一個女兒（係雲）。此外，他們還領養了「一個貧苦無依、賣給戲班子的小姑娘孝華」。見嚴家理，〈嚴幾道先生的家庭〉，《嚴復先生資料輯》（未刊手稿，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該文後經刪節，以〈嚴復先生及其家庭〉，刊於《福建文史資料》，輯 5(1981)，頁 78-95，然在該文中有關伯玉家庭生活的部份或因涉及隱私而被刪除了。見陳恩綺，〈嚴倚雲教授訪問記〉，《嚴倚雲教授紀念文集》（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93），頁 57。

⁹² 嚴復，《嚴復集》，頁 362。呂增祥隨李經方出使日本的時間共約 3 年，確切時間是從 1891 年 1 月 11 日至 1893 年 12 月 26 日。見汪鳳藻，〈隨員期滿請獎摺〉（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軍機處檔》（藏台灣故宮博物院），檔號：130810。作者感謝魏秀梅女士協助查尋此一史料。

稱「畿輔三循吏」。⁹³嚴復很欣賞呂增祥的人品與文章，他曾說：「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手下心，無閒言者，此人而已。」⁹⁴因而常常相互拜訪，「日相娛嬉，有聚合之樂」，並進而結為兒女親家。⁹⁵嚴復對他唯一的批評是「為人太過，作此致不永年」。⁹⁶呂過世後，他在詩中多次言及其仰慕之情：

蓋代循良宰，吾思呂太微。臨財如觸熱，好善怒輞飢。至孝神應泣，論文瑟已希。木田今宿草，黃鳥繞林飛。（〈懷呂開洲〉，1901）⁹⁷

孝友生知者，今成宿草墳。雄深見遺墨，珍襲付郎君。三絕詩文字，一官清慎勤。車過吾亦老，泉路倘同群。（〈題呂開州遺墨〉，1918）⁹⁸

由此可見，呂在文章、詩詞、書法上的造詣。嚴復經常與呂增祥「商榷文字」，《天演論》初稿完成之後，嚴復亦曾請呂增祥修改。⁹⁹

呂增祥也是嚴復與吳汝綸結交的牽線人。如 1897 年 3 月，呂將《天演論》譯稿從天津帶到保定，請吳汝綸指正。吳在信中說：「呂臨城來，得惠書並大著《天演論》，雖劉先生之得荊州，不足為喻。比經手錄副本，秘之枕中。」¹⁰⁰1900 年義和團事件期間，吳汝綸擔心嚴復家庭與《原富》稿本的安危，曾寫信問呂增祥「嚴又陵如何情形？兩令婿現在何處？盧木齋曾否在省？其所挾又陵《原富》底稿七冊未遺失否？至念！至念！」關懷之情表露無遺。¹⁰¹1901 年初，呂增祥還幫助嚴復聯繫吳汝綸，將修訂後的《原富》稿本，交同鄉鄧太守帶去

⁹³ 嚴復，〈嚴復集〉，頁 347。

⁹⁴ 嚴復，〈嚴復集〉，頁 684。

⁹⁵ 吳汝綸，〈答呂秋樵〉，《吳汝綸全集》，冊 3，頁 181。

⁹⁶ 嚴復，〈嚴復集〉，頁 684。

⁹⁷ 嚴復，〈嚴復集〉，頁 366。

⁹⁸ 嚴復，〈嚴復集〉，頁 412。這一首詩作於 1918 年 6 月 4 日。當時嚴復的長媳呂韞清請他為呂增祥整理遺稿，嚴復在其上題下此詩。見嚴家理，〈幾道先生註呂秋樵「月當頭」一詩〉，《嚴復先生資料輯》。

⁹⁹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冊 3，頁 175。

¹⁰⁰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冊 3，頁 144。

¹⁰¹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冊 3，頁 304。有關盧木齋與《原富》稿本的經緯，可參見 1901 年間嚴復寫給張元濟的信。見嚴復，〈嚴復集〉，頁 540-541。

上海，交還嚴復。¹⁰²

許多人都提到嚴復曾拜吳汝綸為師，學習桐城古文。但實際上嚴復只能算是吳的私淑弟子，並非入室門生。郭立志在《桐城吳先生（汝綸）年譜》（1943）中將嚴復與王樹枏、范當世（1854-1905）、林紓（1852-1924）並列，說「四人皆執贊請業，願居門下，而公謝不敢當。曾公所謂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者」，應該是很正確的描述。¹⁰³如果從現存兩人的通信來看，吳汝綸寫給嚴復的信有 8 封，最早的一封是 1896 年 8 月所寫，最晚的一封是 1901 年 6 月；嚴復寫給吳汝綸的信有 3 封，最早的一封是 1897 年底，第二封在 1900 年，第三封在 1901 年底。再者 1893 年以前，嚴復忙於準備科舉，而水師學堂所在地的天津與吳汝綸擔任知州（1881-1889）的冀州，以及主講的保定蓮池書院（1889-1901）之距離，超過一百五十公里，難以當面請益。由此可見，兩人認識無疑是嚴復 1880 年到天津之後，但是比較密切的往來，應該是 1896 年至 1903 年之間的事情。

嚴復在 1900 年致吳汝綸的信中，談到本身中學方面的背景，以及他與吳汝綸的交往，很可以說明兩人間私淑關係的建立時間不長。他感嘆地說，如果早些遇到吳汝綸，自己在文章寫作上，可能會有更好的表現：

復於文章一道，心知好之，雖甘食耆色之殷，殆無以過。不幸晚學無師，至過壯無成。雖蒙先生獎誘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遵十年，豈止如此？¹⁰⁴

簡言之，嚴、吳的師生因緣主要從 1896 年開始，嚴先後請吳指正《天演論》與《原富》譯稿，並請吳為這兩本書寫序，1902 年，兩人同在京師大學堂共事，直至 1903 年吳汝綸過世，才告終止。¹⁰⁵1903 年春，嚴復翻譯的《群

¹⁰² 嚴復，《嚴復集》，頁 540。

¹⁰³ 郭立志編，《桐城吳先生（汝綸）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頁 325。

¹⁰⁴ 嚴復，《嚴復集》，頁 522-523。

¹⁰⁵ 1902 年，吳汝綸曾臨時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並以此一身分赴日本訪問、考察；嚴復則擔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至 1904 年初）。有關此一期間吳汝綸、嚴復，以及兩人與管學大臣張百熙的關係，請參見翁飛，〈吳汝綸與京師大學堂〉，《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24 期 2（2000），頁 96-103；王憲明，〈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64-65。

學肄言》完稿，擬寄請吳汝綸作序，這時才聽說吳已遽歸道山，嚴復在該書〈譯餘贅語〉的最後一段中，以充滿感傷的語調，寫下無比的思念與感懷：

不佞往者每譯脫稿，即以示桐城吳先生。老眼無花，一讀即窺深處。

蓋不徒斧落微〔疑為「微」〕引，受裨益於文字間也。故書成必求其讀，讀已必求其序。……此書凡三易稿，歲暮成書……方欲寄呈先生，乞加弁言，則聞於正月十二日，棄濁世歸道山矣。嗚呼！惠施去而莊周亡質，伯牙死而鍾期絕弦，自今以往，世復有能序吾書者呼！¹⁰⁶

在吳汝綸的「獎誘拂拭」之下，嚴復對他深感「服膺」。在晚清文界，吳師事曾國藩(1811-1872)，乃桐城派後期大師，不但對古文有很深的造詣，「爲文深邈古懿，使人往復不厭」，¹⁰⁷也是嚴復所謂和郭嵩燾一樣，是極少數的「舊學淹貫而不鄙夷新知者」。¹⁰⁸嚴復在他的影響之下，仔細研讀姚鼐(1731-1816)所編的《古文詞類纂》、¹⁰⁹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等書，並進而探究六經，以及曾國藩所推薦的七部典籍：《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鑑》，因而在文字功夫上，獲益良多。¹¹⁰

吳汝綸又爲嚴復譯稿「一爲揚榷」以求「斟酌盡善」，¹¹¹《天演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關《天演論》譯文屢次修改之經過，俞政在《嚴復著譯研究》中有非常細緻的研究。¹¹²嚴復寄給吳汝綸請求指正的稿本，現存於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題爲《赫胥黎治功天演論》。¹¹³該手稿爲墨書，並以紅、藍、綠各色筆作修改，其中黃、藍色的批注乃吳汝綸所下。吳汝綸爲嚴復修改譯稿後，兩人又有書信往返，討論相關問題。根據這些通信，吳汝綸對嚴復的翻譯

¹⁰⁶ 嚴復，《嚴復集》，頁126-127。

¹⁰⁷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合肥：黃山書社，1989），頁286。

¹⁰⁸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收入嚴復，《嚴復集》，頁1550。

¹⁰⁹ 嚴復非常喜愛閱讀《古文辭類纂》，他在該書上寫下許多評語，對韓愈的文字推崇備至。見嚴復，《嚴復集》，頁1179-1239。

¹¹⁰ 此一書單是吳汝綸在1899年4月3日給嚴復的信中所談到的。嚴復，《嚴復集》，頁1564。

¹¹¹ 嚴復，《嚴復集》，頁537。

¹¹² 俞政，《嚴復著譯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頁63-80。

¹¹³ 嚴復，《嚴復集》，頁1410-1476。

工作，至少有以下的幾點建議：

一、強調精確的重要性。吳反對嚴復採取的「換例譯法」，他說：「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元書所稱西方者為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再者，押韻的文字也應以押韻文字翻譯，「歐史用韻，今亦以韻譯之……獨雅詞為難耳」。¹¹⁴

二、當翻譯精確與文字典雅有衝突之時，吳汝綸主張「與其傷潔，勿寧失真」。此點反映吳依循桐城派的傳統，將文字的達與雅放在很高的地位，「凡瑣屑不足道之事，不記何傷。若名之為文，而俚俗鄙淺，薦紳所不道，此則昔之知言者無不懸為戒律。」¹¹⁵

三、吳主張參考晉、宋翻譯佛書的先例，將翻譯文本與個人的論述嚴格區分，「凡己意所發明」歸於文後「案語」。¹¹⁶

四、「命篇立名，尙疑未慊」。原稿各段落之標題原分為「卮言」與「論」兩部份，並加數字，後來「卮言」又改為「懸疏」。吳覺得卮言、懸疏二詞均不妥當，他建議「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以明宗旨。¹¹⁷

五、吳汝綸斟酌字句得失，刪除了一些原稿中不妥當之處。例如，手稿中原談到「言物理天道者……達爾文、錫彭塞、赫胥黎為之最」，吳汝綸認為：「此譯赫氏書似不宜稱及赫氏」。¹¹⁸

從手稿本修改的痕跡可知，嚴復幾乎完全接受了吳的建議。他在回信之中說：「拙譯《天演論》近已刪改就緒，其參引己說多者，皆削歸後案而張皇之，雖未能悉用晉唐名流翻譯義例，而似較前為優，凡此皆受先生之賜矣。」¹¹⁹再者，嚴復將「卮言」改為「導言」，並且接受大部份吳汝綸所擬定的小標題。¹²⁰

¹¹⁴ 嚴復，《嚴復集》，頁1560、1565。

¹¹⁵ 嚴復，《嚴復集》，頁1564。

¹¹⁶ 嚴復，《嚴復集》，頁1562。

¹¹⁷ 嚴復，《嚴復集》，頁1562；嚴復，〈譯例言〉，《天演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2。

¹¹⁸ 嚴復，《嚴復集》，頁1415。

¹¹⁹ 嚴復，《嚴復集》，頁520-521。

¹²⁰ 根據俞政的研究，「上卷18篇中，嚴復採用了吳擬小標題17個；而在下卷17篇中，嚴復採用

由此可見，《天演論》以目前的面目出現，吳汝綸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吳汝綸雖不通西文，但是他從中國翻譯傳統（即他在信中所說的「舌人之法」）所汲取的觀念，使他對翻譯體例、文字精確與典雅等方面，有很清楚的想法。尤其是一方面尊重原作、重視精確，另一方面以「與其傷潔，勿寧失真」的原則來解決信與達雅之衝突，此一想法對嚴復後來的翻譯工作有深遠的影響。1902年，嚴復回應梁啟超〈紹介新著：《原富》（斯密亞當著·嚴復譯）〉一文，論及翻譯文字：

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中國文之美者，莫若司馬遷、韓愈。而遷之言曰：「其志潔者，其稱物芳」。愈之言曰：「文無難易，惟其是」。僕之於文，非務淵雅也，務其是耳。¹²¹

這樣的觀點基本上完全繼承了吳汝綸桐城派的學術傳承。

吳汝綸對《天演論》的貢獻還有一個一般人較少注意之處，即《吳京卿節本天演論》一書。該書於1903年6月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附圖三）。同一年，北京華北譯書局出版的期刊《經濟叢編》第3冊至第6冊，也刊載了《吳京卿節本天演論》。¹²²有關此一版本的來龍去脈，在孫應祥與俞政的文章中已有說明。¹²³如果對照此一節本與目前各種《天演論》的版本可知，它實際上是錄自吳汝綸的日記，也就是1897年春天，吳汝綸在為嚴復修改手稿本《赫胥黎治功天演論》時「手錄副本」者。吳汝綸在與嚴復書中說：「老懶不復甄錄文字，獨此書則親書細字，錄副襲藏，足以知鄙人之於此文，傾倒至矣。」他在寫給呂增祥書中也說：「幼陵觀察所譯《天演論》，果為奇書，赫胥黎故善談名理，幼公文筆縱橫，尤足推倒一時豪傑。愛不忍釋，因親錄副本，藏為鴻

了吳擬小標題11個。」見俞政，〈嚴復著譯研究〉，頁16。

¹²¹ 嚴復，〈嚴復集〉，頁516。

¹²² 李珍，〈《天演論》的歷史地位與學術影響〉，載（中國大陸）國家清史編委會網上工程，「中華文史網」，<http://www.historychina.net/qinghistory/history/Index.aspx?id=150&articleid=2046>。

¹²³ 俞政，〈嚴復著譯研究〉，頁19；孫應祥，〈《天演論》版本考異〉，收入黃瑞霖主編，《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福州：方志出版社，2003），頁330-331。

寶。」¹²⁴

或許在吳過世後，其子吳闡生(1877-?)整理其父手澤時發現此一節錄，因而交給廉泉（1868-1931，吳芝瑛之夫、吳汝綸之侄女婿）所經營的文明書局出版。吳闡生指出，「此編較之原本，刪節過半，亦頗有更定，非僅錄副也」，這樣的觀察是非常正確的。我們可以舉第一段為例，此段吳之節錄如下：

赫胥黎獨居一室，懸想英吉利二千年前羅馬將軍愷徹未到時，草木叢蕪，此怒生者如爭相雄長，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強者後絕，弱者先亡。今英之南野，惟黃芩為多，英地氣冷，黃芩能寒，故久而益茂。今之種類，皆未有記載以前，居人采擷所餘之苗裔耳。此區區一草，迹其祖始，遠及洪荒，因是知天道變化，不主故常，今茲所見，乃歷劫變遷以成最後之奇，繼今以往，變遷又可知矣。何以明之？今掘地深丈許，往往見蜃灰，蜃灰者，乃螺蛤蛻甲積累而成，用顯微鏡察視，其螺旋猶具，知此地故海底也。地學家積驗各化石，知動植萬匯，遞有變遷，其變至微，其遷積漸，雖有彭聃之壽，莫由窺知耳。故知謂「天道不變」，決非知天；獨此至變之中，有不變者二端，一曰「物競」，一曰「天擇」。「物競」者，物爭自存也。爭焉而獨存，必有所以存，所以存者得天獨多，又自致其能，而所遭值之時與境，又足憑藉之，而後獨免於亡而自存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獨為天所厚，而天乃擇於眾有而存之者，是之謂「天擇」。達爾文曰：「天擇者，存物之最宜者也。」夫物既爭而自存，天又擇其最宜而存之，一爭一擇，而變之事起矣。——察變¹²⁵

如對照嚴譯原文可見：一、節錄的字數只有原文的三分之一左右；二、吳汝綸刪除了枝蔓之後，使文字變得簡潔、緊湊，成為典雅、純正的中文，完全沒有翻譯的痕跡；三、文中以「物競」、「天擇」之原則來觀察世變之主旨，顯得

¹²⁴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冊4，頁624。

¹²⁵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冊4，頁582。

非常突出；四、吳汝綸增加了說明段落主旨之小標題，置於節錄文字之後。

此一節本在出版後頗受歡迎，當時有些學校即採用該書為國文教科書。1905年，15歲的胡適(1891-1962)就讀於上海澄衷學堂，他在《四十自述》中說：

澄衷的教員中，我受楊千里（天驥）的影響最大……後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伸其義」。（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長曹錫爵先生和現在的校長葛祖蘭先生曾在舊課卷內尋出，至今還保存在校內。）這個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瞭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的意義。……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的心和血。¹²⁶

胡適的經驗應該有其代表性。《吳京卿節本天演論》除了由文明書局印行出版之外，還有一些人親手抄錄，蘇州大學圖書館即藏有一手抄本。¹²⁷這顯示吳汝綸的節本對於《天演論》的傳播，尤其是從「『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的意義」來理解該書，起了極大的作用。

一般人在討論《天演論》時，往往將焦點放在嚴復的身上，而不夠注意嚴復的成就其實不是他個人的成就，呂增祥、吳汝綸等知交、師友都貢獻了一部份的心力。其中吳汝綸親自為之修改、作序，更使該書宛如受到大師「加持」，

¹²⁶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6），頁49。胡適這一篇作文後收入周質平主編，《胡適早年文存》（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頁433-434。楊千里在篇末批有「富於思考力，善為演繹文，故能推闡無遺」16字。

¹²⁷ 前政，《嚴復著譯研究》，頁19。

其聲望因而陡然提升。《天演論》完成之後，嚴復在翻譯工作上更為得心應手，此後陸續翻譯了其他名著，終於成為近代中國通曉西語、親歷異域而引介西學的第一人。

五、結語：不能與人競進熱場，乃為冷淡生活

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工作的二十年，簡單地說，是從宦海失意到走上翻譯之路。在該校中，他從 1880 年擔任「洋文總教習」開始，十三年後升到四品的「總辦」，就仕途而言，並不順遂。他考不上科舉、不受到頂頭上司李鴻章的重用，甚至投奔張之洞的願望也落空了；後來他因聲名日上，受到光緒的召見，卻不蒙提拔，一直只能「擁皋比」（教書）而「不官」。¹²⁸在教學上，嚴復似乎也不很成功，有學生覺得他的教學枯燥無味，他自己也得不到成就感。1918 年，他在寫給友人熊純如的信中說：「復管理十餘年北洋學堂，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伍展宸（光建）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少泉（劭廉）篤實，而過於拘謹。二者之外，餘雖名位煊赫，皆庸才也。」¹²⁹

在仕宦、教學兩不得意之下，嚴復心情之落寞，可想而知。他的挫折感也來自他所構思的改革方案與當時多種看法格格不入：他一方面反對下層社會的暴力運動（如義和團），與知識分子領導的種族革命；另一方面不贊成張之洞的保守作風，與康有為、梁啟超的躁進改革。這些因素都逼使他調整人生的步伐。幸好他在準備科考以及與名士過從之中，體會到中學的堂奧，再加上他對西學的熟稔，使他能「總中西二學」。¹³⁰1895 年之後，嚴復走向翻譯之途，直接因為甲午戰敗，中國潰不成軍，師友、學生喪命疆場；另一方面，也是由

¹²⁸ 嚴復的兒子嚴璩雖不如他有名，但在官場晉升之上，卻是一帆風順，多次出使國外；宣統元年時，又曾擔任「福建正監理官並奉上諭賞加四品卿銜」，北洋時期做到財政部次長。見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冊 8，頁 194-195；嚴家理，〈嚴復先生及其家庭〉，《福建文史資料》，輯 5，頁 90。

¹²⁹ 嚴復，《嚴復集》，頁 687。

¹³⁰ 嚴復，《嚴復集》，頁 1560。

於長期以來，他在外在世界屢遭挫折，胸懷大志又無從施展，只好退居書齋，「遂譯自娛」。¹³¹嚴復無疑地在翻譯工作之中找到新的挑戰與寄託。他在與張元濟的通信中多次談到翻譯工作之艱辛：

鄙人於譯書一道，雖自負於并世諸公未遑多讓，然每逢義理精深、文句奧衍，輒徘徊躊躇，有急與之博力不敢暇之概。¹³²

復近者以譯自課，豈不欲旦暮奏功，而無如步步如上水船，用盡氣力，不離舊處，遇理解奧衍之處，非三易稿，殆不可讀。……復今者勤苦譯書，羌無所為，不過閔同國之人，于新理過於蒙昧，發願立誓，勉而為之。¹³³

上文可以反映嚴復投身翻譯工作的決心與志氣。

然而嚴復內心深處還是對自己走入書齋的翻譯工作感到怨嘆，他說「自嘆身游宦海，不能與人競進熱場，乃爲冷淡生活；不獨爲時賢所竊笑、家人所怨咨，而擲筆四顧，亦自覺其無謂。」¹³⁴對嚴復而言，書房中的「冷淡生活」終究只是不得已之下的次一選擇，他心中真正想要成就者乃得君行道的經國大業。換言之，從官場失意轉向翻譯工作，與其視之爲嚴復從政治領域轉到學術領域，還不如說，他以學術工作來從事政治參與，希望能「主文譎諫」、有裨時政。¹³⁵1906年6月20日，嚴復請鄭孝胥寫了一個對聯，掛在書房之中，聯曰：「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聖人起，不易吾言」，¹³⁶充分反映出嚴復企圖指點江山的渴望。很可惜他從不曾實現此一夢想，在晚年反而因爲轉向「保

131 嚴復，《嚴復集》，頁544。

132 嚴復，《嚴復集》，頁537。

133 嚴復，《嚴復集》，頁527。

134 嚴復，《嚴復集》，頁5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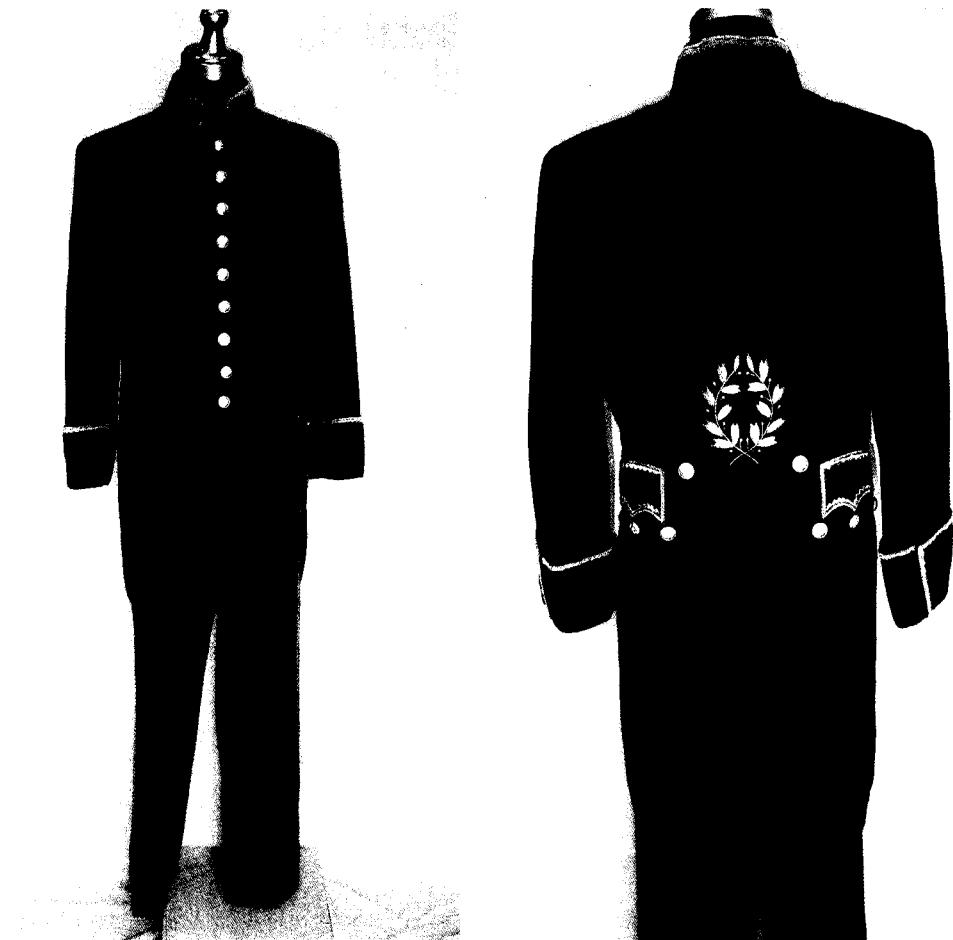
135 吳汝綸致嚴復函論及《天演論》，他說該書「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爲主文譎諫之資。」見嚴復，《嚴復集》，頁1560。嚴復在《天演論》的自序中說，「〔此書〕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爲遂譯，有以多符空言，無裨實政相稽者，則固不佞所不恤也。」見嚴復，《天演論》，頁3。

136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頁1046。嚴復非常喜歡這個對聯，1907年7月14日，他又請《大公報》創辦人英華（斂之，1867-1926）再寫一次，英在日記中寫道：「與嚴又陵寫八言聯一副。詞曰：『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聖人起，不易吾言』。」見孫應祥，《嚴復年譜》，頁311。

守」、「復古」，在激進的時代中飽受抨擊，落寞以終。他留給後世的主要不是道德與事功，而是「峻潔平淡」的文章，與「以瑰辭達奧旨」的翻譯文字。¹³⁷這樣生命轉折是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時期因緣際會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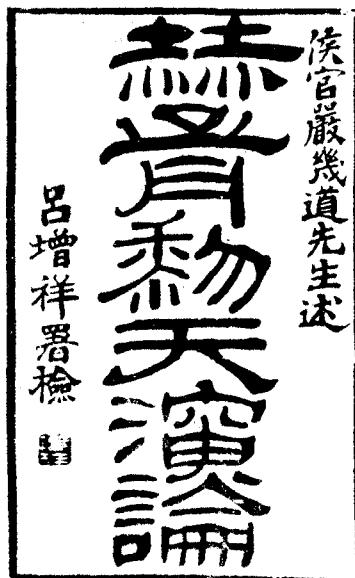
¹³⁷ 嚴復，《嚴復集》，頁 703、1542。

附圖一：嚴復的海軍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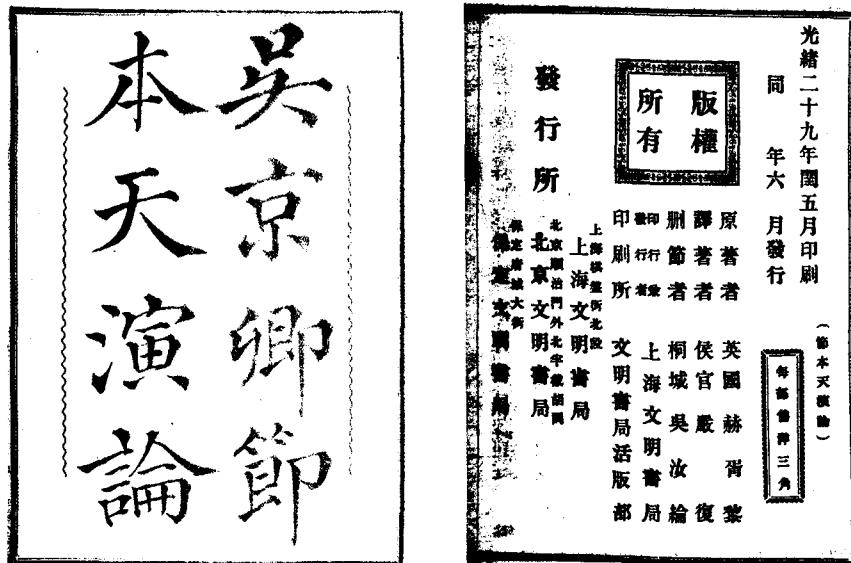
說明：藏鹿港民俗文物館

附圖二：富文書局本《天演論》(1901)



說明：嚴復，《嚴復集》，冊5，圖片部份，頁5。

附圖三：《吳京卿節本天演論》封面與版權頁



徵引書目

一、檔案、報刊、訪問紀錄

- 《學部官報》，期 113。台北：故宮博物院影本，1980。
- 《嚴復函札彙鈔》。未刊手稿，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
- 戶部纂輯，《光緒朝捐納則例》。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
- 吳家瓊，〈嚴復軼事及《福建通誌》不為立傳的原因〉，《嚴復先生資料輯》。未刊手稿，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
- 汪鳳藻，〈隨員期滿請獎摺〉（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軍機處檔》。藏台灣故宮博物院，檔號：130810。
- 時務報館編，《時務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
- 陳寶琛等纂，《德宗景皇帝實錄》。台北：鼎文書局，1980。
- 嚴家理，〈幾道先生註呂秋樵「月當頭」一詩〉，《嚴復先生資料輯》。未刊手稿，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
- 嚴家理，〈嚴幾道先生的家庭〉，《嚴復先生資料輯》。未刊手稿，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

二、專書

- 王中江，《嚴復》。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5。
- 王 枝，《嚴復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 王憲明，《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0。
- 皮後鋒，《嚴復大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2。
- 吳汝綸，《吳京卿節本天演論》。上海：文明書局，1903。
- 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
- 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與道咸同光時代》。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80。
- 周質平，《胡適早年文存》。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
- 俞 政，《嚴復著譯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
- 姜 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 唐文基等編，《陳寶琛與中國近代社會》。福州：陳寶琛教育基金籌委會，1997。
- 孫應祥，《嚴復年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孫應祥、皮後鋒編，《嚴復集補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
- 桑 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 馬昌華主編，《淮軍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合肥：黃山書社，1995。
- 高宗魯譯註，《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
- 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 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繫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 郭立志編，《桐城吳先生（汝綸）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
- 陳衍等編纂，《閩侯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據1933年刊本。
- 陸寶千，《劉蓉年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冊2。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合肥：黃山書社，1989。
- 鄭孝胥，《海藏樓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盧美松主編，《嚴復墨迹》。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4。
-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界書局，1936。
- 錢鍾書，《石語》。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9。
- 錢鍾書，《談藝錄》。上海：開明書店，1948。
- 羅香林，《梁誠的出使美國》。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7。
- 羅耀九主編，《嚴復年譜新編》。福州：鷺江出版社，2004。
- 嚴 復，《漪壘堂詩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 嚴 復，《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三、論文

- 王憲明，〈解讀《闢韓》——兼論戊戌時期嚴復與李鴻章張之洞之關係〉，《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頁113-128。
- 王鐵藩，〈嚴復家鄉陽岐調查記〉，收入福建省嚴復研究會編，《93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
- 史春林，〈嚴復任職北洋水師學堂期間若干史實再考證——兼與馬自毅先生商榷〉，《福建論壇》，2005年第3期，頁72-77。
- 巫光榮，〈嚴復與陳寶琛〉，《嚴復與家鄉》。福州：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1985。
- 李 珍，〈《天演論》的歷史地位與學術影響〉，載（中國大陸）國家清史編委會網上工程，「中

- 李 珍，〈《天演論》的歷史地位與學術影響〉，載（中國大陸）國家清史編委會網上工程，「中華文史網」，<http://www.historychina.net/qinghistory/history/Index.aspx?id=150&articleid=2046>。
- 李 斌，〈嚴復與《國聞報》〉，收入福建省嚴復研究會編，《嚴復與中國近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8。
- 施培毅，〈我國近代教育先驅吳汝綸〉，《江淮論壇》，1995年第1期，頁86-96。
- 孫應祥，〈《天演論》版本考異〉，收入黃瑞霖主編，《中國近代啓蒙思想家》。福州：方志出版社，2003。
- 翁 飛，〈吳汝綸與京師大學堂〉，《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24期2，2000，頁96-103。
- 馬自毅，〈「總教習」還是「洋文正教習」——嚴復任職北洋水師學堂期間若干史實考證〉，《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頁68-84。
- 張紹祖，〈嚴復天津故居考證〉，「紀念嚴復誕辰150周年學術研討會」。福州：福建省嚴復研究會，2004年2月8-10日。
- 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明清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陳衍等編纂，〈福建文苑傳〉，《福建通志》。福州：福建通志局，1922，卷66-68。
- 陳恩綺，〈嚴倚雲教授訪問記〉，《嚴倚雲教授紀念文集》。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93。
- 章炳麟，〈與人論文書〉，《太炎文錄初編》，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冊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華 嚴，〈吾祖嚴復的一生〉，收入王慶成主編，《嚴復合集》，冊5。台北：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
- 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台大文史哲學報》，期56，2002，頁29-48。
- 黃曾樾輯，〈陳石遺先生談藝錄〉，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 鄭孝胥、嚴復，〈鄭蘇盦嚴又陵酬和近作〉，《東方雜誌》，第5年第7期，1908，頁1-2。
- 嚴 復，〈致章太炎〉，收入王慶成主編，《嚴復合集》，冊5。台北：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
- 嚴 復，〈譯例言〉，《天演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 嚴 琨，〈侯官嚴先生年譜〉，收入嚴復，《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嚴家理，〈嚴復先生及其家庭〉，《福建文史資料》，輯5，1981，頁78-91。
-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1。

Beginning a New Career in Translation: Yan Fu at the Northern Naval College

Max K. W. 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Yan Fu's experiences during his period at the Northern Naval College in Tianjin (1880-1900) to see how, as he became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with politics, he turned to a new career in translation.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ections:

First, Yan Fu's career at the Northern Naval College. This author uses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Resumes of Qing Officials* and other sources to explore the progress of Yan's career at the College. These records indicate that Yan started his teaching job as a superintendent for Western learning. In 1884 he was awarded by the emperor for effectively running the Northern Naval College. In 1889 he was promoted to be vice president, and in 1893 he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College.

Second, Yan Fu's experiences with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 career trajectory. During Yan's Tianjin period, he spent more than a decade preparing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He took the examinations four times, failing each time. This highly frustrating experience helped him underst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shortcomings while also giving him an opportunity to read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 and thereby obtain a good command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Later he was able to use elegant Chinese to translate Western works, which brought him fame as a translator.

Third, Yan Fu's friendship with Lu Zengxiang and Wu Rulun. Yan, Lu, and Wu all belonged to the Li Hongzhang group,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Lu and Wu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Evolution* (*Tianyan lun*, a translation of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was indispensable. Lu was Yan's good friend, and Yan's son was married to Lu's daughter. Wu, a master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was highly respected by Yan, and he corresponded with Yan closely between 1896 and 1903 on various issues. Lu and Wu proofread Yan's translation of *Evolution and Ethics*. Therefore, the success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Evolution* was achieved not by Yan alone but by a group of people. Wu in particular gave Yan numerous suggestions, wrote a preface, and produced an abridged version to spread the book's ideas to school studen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for Yan, doing translation was only his second choice. His preferred career trajectory would have been official service: he wanted to be trusted by the emperor and to help govern the country. Thus, Yan's turn to translation should be seen less as a departure from politics and a turn toward scholarship, and more as a form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

Keywords: Yan Fu, Wu Rulun, Lu Zengxiang, Northern Naval College, *The Theory of Natural Evolution*